

文化：世界衝突的來源 抑或融合的起點？

何俊全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的大文〈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從國際權力政治的觀點，預言後冷戰時代即將來臨的新的世界形勢，基本的衝突來源將不是以意識形態，亦非以經濟為主導，而是以文化為主導，發生於不同文明的國家與族群之間。質言之，文明的認同在未來的世界中將益形重要，整個世界政治舞台的演出，基本上將由七、八個主要文明之間的互動形成。這些主要文明包括西方、儒家、日本、回教、印度教、斯拉夫—東正教、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文明。各主要文明之間，存在文化的斷層線，循着這些文化斷層線來追索，差不多可以描繪出未來世界衝突的整個大勢。

做為一位西方學者，站在西方立場，亨廷頓指出未來國際政治運作的主角，將不再如以往一般，由西方文明內的國家擔任，而非西方國家只是西方國家玩國際政治遊戲時搬弄的對象。相反的，非西方國家將與西方國家一樣，躍居國際政治的主導角色。因此，未來國際政治的運作軸心，將是以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互動為主軸。他並且大膽預言，在可預見的將來，世界衝突的核心焦點，將發生在西方與若干回教—儒家的國家之間。在主要的反西方力量中，他特別注意到中國軍事力量的持續擴張，及其藉着武器與軍事科技輸往中東回教國家所形成的軍事結合，正象徵儒家文明與回教文明之間的聯合。儒家—回教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是以文明衝突為主導力量的未來世界舞台上最可能的第一場演出。因此，他呼籲西方國家，應加強促進本身文明內部的整合，特別是歐洲與北美子文明之間的合作關係，並將文化與西方接近的東歐及拉丁美洲融入西方，促進並維繫與俄羅斯及日本的合作關係。對於儒家與回教國家的軍事擴張，應加以抑制；西方國家並應放緩削減軍事力量的步伐，以繼

續維持軍事優勢。除了藉機挑激儒家與回教國家之間的差異與衝突之外，西方國家並且應藉着現有掌控國際組織的優勢，結合支持西方價值及彼此利益一致的其他文明族群，以鞏固西方的價值與利益。

亨廷頓的上述論點，就其基本論據而言，有其就理念層面所強調之文明間的差異，乃是最基本而真實等等觀點；以及追溯人類歷史經驗，主要文明之間長期持續衝突。這些顯然無法構成一種嚴密的論據，只能說是對他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提供一些理念上及歷史經驗方面的佐證而已。當然，像這樣一項對未來世界政治運作本質的預測，其嚴密的論據顯然不是一篇短文適合為之。亨廷頓教授在文章標題加上疑問號，其實已表明其所提，基本上定位在一種啟發性(heuristic)論點。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直接的靈感應是來自以一位西方人的立場，綜觀整個世界政治圖象，發現對西方權力採取強烈頑抗態勢的，在後冷戰時代就剩下中國與中東若干回教國家了。在亨廷頓眼中，相對於西方文明，東方的儒家與回教文明似乎異質性相當高；另一方面，中國對中東國家的武器與軍事科技輸出，構成軍事上某種聯合的態勢。加上就經濟力量而言，儒家文明之下的中國、香港、台灣、星加坡以及東南亞國家華人社群，已經形成一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舉足輕重的東亞經濟集團。此一經濟集團在中國與台灣逐漸克服意識形態的歧異，轉而在共同文化之下順利進行經濟整合，使兩岸之間走得更近，而未來勢將以中國為核心，形成一強有力的經濟體。從一位國際政治學者的觀點來看，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乃是國際政治角色扮演的的主要憑藉。亨廷頓顯然深刻地覺察到，一個以中國為首，擁有強大軍事與經濟實力的華人社會，以及擁有相當軍事實力，掌控世界能源命脈，反西方意志堅強的中東國家，將是未來抗衡西方的主要力量；而兩者之間某種軍事聯合的存在，尤將使國際政治的天秤有失衡之虞。如果東亞的華人社會能夠在儒家文明之下整合，那麼，中東國家在回教文明整合之下，目前若干國家親西方的政策是否持續，恐怕皆成問題。事實上，依照亨廷頓本文揭示的文明衝突論觀點，國家的文明身分既然優先於意識形態、經濟、階級等等因素，則未來在儒家文明之下整合的東亞國家，與在回教文明之下整個的中東國家，將是下一波世界衝突的主角。衝突的基本根源，在於文明身分之不同。質言之，在相同的文明身分之下，結合不同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將以國家集團的方式扮演世界衝突的要角。

從國際權力政治的層面來看，筆者認為亨廷頓在本文中揭示的文明衝突論，顯示其有深厚的學養，乃能發而為此一具相當創造性的洞見。在可預見的將來，從國際政治的現實本質來看，筆者認為亨廷頓對未來世界衝突的基本看法，可以說相當深刻。當然，誠如波柏(Karl R. Popper)所言，從嚴格的科學方法論觀點，我們可以進行科學的預測(scientific prediction)，卻不表示我們

可以妄做歷史的預言(historical prophecy)。即使是可預見的未來，仍然存在很多歷史中的變數：何況如同上述所言，亨廷頓在本文中的論據，尚不能算是嚴格論證，而是佐證的性質居多。然而無論如何，文明衝突論仍將是吾人觀察未來國際政治發展，一項具有創意的重要指標。

不過，筆者認為亨廷頓教授在國際政治層面具備深刻洞見，乃至傾向同意他對可預見的未來世界衝突的基本觀察，並不表示完全認同他的論點。事實上，以文明為未來世界衝突的根本來源，超越國際現實政治層面，而從對人類未來命運一種普遍性底人文關懷層面來看，亨廷頓的論點不但令人深感不安，而且難以苟同。所以深感不安，是因為此一基於國際現實政治層面所形成的論點，在亨廷頓提出之後，特別是其呼籲西方文明世界團結整合之下，勢將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運作上的決策，使其對未來世界衝突的觀察，更有成為事實的可能。所以難以苟同，是因為相較於其他世界衝突的根源，諸如種族、經濟、階級等等因素，以及本質上為上述衝突因素之包裝的意識形態衝突，以某種文化為核心的文明，不但不應該是世界衝突的來源，反而應該是世界融合的起點。一種文明能夠在世界上長期存續發展，諸如西方文明、儒家文明以及回教文明等等，必然有其做為文明核心的文化，涵育某種人類理性成熟表現之質素。儘管由於地理的、歷史的乃至生物遺傳上的因素，各大文明之間存在異質性，然而只要我們不否認各大文明皆同為理性動物之人類創造的產物，則異文明之間加強並擴大理性的對話，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從政治、社經乃至宗教信仰方面，我們似乎觸目所見皆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異質表現：然而如果從人文層面做理性底檢視，我們何嘗不可澄汰出某些人類文化的普同價值。例如在政治及社經方面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在宗教方面對人的終極關懷(儘管信仰的超越者未必相同)之尊重。(事實上，宗教信仰自由即是基本人權之一。)無論如何，只要我們不否認理性乃人心之所同然(所謂「心同理同」)，則不同文明之間的理性對話即有可能。擴大並加強這種文明之間的理性對話，將使文明不但避免成為下一波世界衝突的根源，還將成為世界融合與和平之起點。

亨廷頓教授在其文章末尾，亦呼籲西方對其他非西方文明基本的哲學與宗教信念進行深入底了解，也應該了解非西方文明看待其自身利益的方式，並且努力去尋求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共同性底質素。不過在可預見的未來，他預期不可能出現人類的普同文明，而仍將是不同文明並存的世界。因此，他亦強調不同文明之間學習如何彼此共存的重要性。儘管強調異文明之間學習共存的重要性，不過通觀全文論旨，文明之間的衝突似乎在客觀上不可避免，文明共同性底尋求與彼此學習共存之道，似乎只不過是全文聊備一格的一點主觀期待而已。

筆者以為，世界各文明之間的理性對話，要能有效進行，不能依賴在國際政治上縱橫捭闔的各國政客。文明之間的理性對話，必須站在對等的立場以及彼此尊重的原則上進行；然而政客們關心的是利益（不論是個人利益或國家利益），在利益掛帥之下，文明價值變成追求國家利益的工具。以上述最具普遍價值的人權而論，美國人權外交的推動，不啻顯示人權亦為外交政策之工具。再則，在各國政客們的運作之下，不同文明之間發言的份量，勢將取決於軍事與經濟實力，何來對等與彼此尊重？質言之，文明之間的理性對話，不可能透過各國政客們在談判桌上進行。不同文明之間對等而善意的良性對話與互動，恐怕必須在非政治性的層面中進行。更重要的是，在現代世界中居於優勢地位的西方文明，如何放下身段，誠意地與非西方文明對等、理性地對話，而非擺出要其他文明同化於我的高姿態，恐怕將是文化融合成效如何的決定性因素。

要之，亨廷頓教授以文化為下一波世界衝突的根源，我人實無法局限於從國際政治的層面來看待此一論點。亨廷頓將其論點限定在人類不可能形成普同文明的可預見將來，顯示其持論力求審慎與周延。然而其揭示文明衝突論的強烈訊息，勢將掩蓋其文化融合的一點點主觀期待。其將給予未來國際政治舞台何種影響，似乎不問可知。筆者衷心期待，我人看待亨廷頓此論，千萬不要忽略在國際政治層面之上，還有更高的人文層面。從一種更高的人文層面來考察，我們將會發現文化不是世界衝突的根源，而是世界融合的起點。在整個世界已因科技發展，而推向一種彼此命運與共、息息相關的地球村之際，談文化經由對話而趨向彼此融合，似乎已不是高調，而是人類已然面對的一項迫切的課題。

何信全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